

一带一路上古文明的交响与和鸣 ——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

林丰民 林 哲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然远隔千里，但两个民族之间唐代以前就有经贸往来，唐以后更加频密，与之相伴的还有两国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然在交流规模上远不及商贸往来，但其独特的光彩从未被后者掩盖。从唐代到近代都可见两个古老文明交流、借鉴的熠熠光彩，进入现当代，中阿间的文学交流与互译随着中阿国家间外交、经贸、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而达到了新的水平，更加令人瞩目。譬如，阿拉伯国家的读者先是通过《论语》、《道德经》的英文译本，继而通过阿语译本领略了中国哲学之美，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阿拉伯世界更是出现了不少中国小说的阿拉伯文译本；不少中国读者对黎巴嫩旅美派诗人纪伯伦作品中的许多句子耳熟能详；埃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的一些代表作品如《开罗三部曲》在中国甚至有数个译本。与此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界对对方国家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稳步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学术价值上都在最近的四十年有了很大提升。

阿拉伯国家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需要我们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也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交往的历史，其中包括文化的交流。《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由钱林森教授、周宁教授担任总主编，由郅溥浩研究员、丁淑红副教授、宗笑飞副研究员撰写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笔者就深感惊讶，因为它超乎我的想

象。在“中外文学交流史”项目启动的时候，钱林森教授曾经找过几位国内从事阿拉伯研究的学者，其中也包括我本人，但因为当时我由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日常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这一课题的研究，只能婉言感谢钱林森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婉言谢绝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我对写一部“中国阿拉伯文学交流史”有些畏难情绪，感觉到材料搜集比较困难，中阿文学交流的事实不够充实。因此，当我得知郅溥浩先生应允负责这一著作的撰写时，我最初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觉得书出来以后可能只会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没想到现在呈现在笔者面前的是一本皇皇巨著。不由感叹老前辈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我辈后学实难望其项背。

这部近五百页的大作详细载录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文学交流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交流情况，编织出一幅动人的中阿文学交流彩卷，远观、总览千年来的交流概貌，近察、细数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体裁文学作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这部巨著有效填补了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在中阿文学交流研究方面的学术空白。我们相信，对于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对于初涉阿拉伯文学的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对于东方文学尤其是阿拉伯文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来说，这本书定能成为他们投入阿拉伯文学研究海洋时的“航行指南”和可靠助手。

本书的成功写作首先得益于三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国内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学者身份，河南大学的马征曾指出：

长期以来，国内的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处于“专家”与“非专家”壁垒分明的状态：“专家”囿于语言的界限，很少去了解阿拉伯语言文学以外的理论与知识，缺少从理论的视野和高度，对阿拉伯文学有目的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非专家”远远地站在阿拉伯语言之外，要么依照东方文学的整体框架，对阿拉伯文学“生拉硬套”，要么对阿拉伯文学泛泛而论，所谓“研究”有

趣而缺乏学术根据与深度，固然可以娱人心智，普及文化知识，引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与严肃、认真的研究相差甚远！^①

马征所说的这种“专家”与“非专家”壁垒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但是随着高校阿拉伯语教学和学术的发展，这种壁垒在慢慢改变。掌握阿拉伯语的年轻学者特别是阿拉伯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在导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努力学习文学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非专家”所培养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某些高校也有机会学习阿拉伯语。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的三位作者均为阿拉伯语科班出身，且长期从事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他们也都有过留学阿拉伯国家或者在阿拉伯国家工作过的经历。他们是真正的阿拉伯文学“专家”。尤其是郅溥浩研究员曾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学和埃及的开罗大学留学、进修，还曾借调到阿拉伯国家工作。而在中阿文学的交流活动中，郅溥浩先生还是很多文学交流活动的亲历者，不仅到过阿拉伯国家访问，而且还接待过阿拉伯作家代表团的来访。

除了郅溥浩研究员以外，另外两位作者丁淑红和宗笑飞也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她们在阿拉伯民间文学、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中阿比较文学等领域的成果为学界所有目共睹。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三位著者不光利用自身已取得学界一致认可的研究成果和一手材料，还细致地搜集了大量新的史料。如早期国内出现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的各个译本、特殊时期我国文学工作者为声援阿拉伯人民而创作的各种诗文集、新时期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各种活动资料等（有些甚至是没有刊行的内部资料）。著者将一批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加以剪裁、切削，将中阿文学交流的细致幽微之处悉数展示在读者面前。书中俯拾皆是的史书资料记载和大量中阿文学人士的交流照

① 马征：《刍议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以〈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为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5年第1期，第155页。

片、来往信件、访问手记、纪念文章，充实了全书内容，更是增加了这部交流史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在本书刊载的照片中，我们发现莫言和埃及当代著名作家杰马勒·黑塔尼的合影、曹彭龄^①和阿拉伯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马哈福兹的合影。^②据笔者所知，郅溥浩先生收集、保存了很多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与阿拉伯作家、诗人交往的珍贵照片。书中所刊载的只是少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照片。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而有关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及其学术活动的情况，由于20世纪80—90年代阿拉伯文学在外国文学界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很少，留下来的公开资料不多。是郅溥浩先生强烈的学术意识让他收集、保留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当然他多次担任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职务，也为他留存这些资料提供了便利。尽管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各种学术活动不是与阿拉伯文学界的直接交流，但也是中阿文学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只是考察、分析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非专家”就能做，而且由于理论的修养可能还会做得更好。但是研究中阿文学交流，要考察的是双向的交流情况，对于阿拉伯相关方面的情况也必须也只能由懂阿拉伯语的“专家”来做。本书的三位作者因为长期从事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了“非专家”的理论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精通阿拉伯语，这成为他们考察中国文学在阿拉伯翻译、研究情况的必要条件。于是我们看到了第八章“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重点考察了20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科威特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阿拉伯翻译界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和《诗经》以及一批中国古典诗歌、话本小说、戏剧，还有四大名著的各种节译本。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阿拉伯人开始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学，一批现代文

① 我国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专家、作家、翻译家曹靖华的儿子，曾任中国驻埃及武官（少将军衔）。

② 国内还有多位阿拉伯文学研究学者曾经拜访过诺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并留下珍贵的照片。

学作品如鲁迅、老舍、巴金、茅盾、曹禺等作家的不少作品被翻译到阿拉伯国家。由于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他的革命理论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且他的诗词也被阿拉伯国家翻译出版。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网络文学引起了当代阿拉伯文学翻译界的翻译兴趣。译作的出现带来的是相关学术研究的生发。目前阿拉伯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文本的研究上。所有这些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这部分的研究有个小小的缺憾，就是那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没有用阿拉伯文加以标示。在如今，标示阿拉伯文的技术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也不知道是作者没有提供阿拉伯文原文，还是出版社为了体例的统一而做了处理。如果标示了阿拉伯文，就可以给其他的阿拉伯语“专家”和读者提供一个路径，将来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部分的研究成全了全书的格局，使得中阿文学交流史的全书结构变得相对完整。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详略有致，同时又不遗漏重要的专题。书中详细考察的是 1949 年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略说的是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翻译与研究。这是符合中阿文学交流事实的。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尽管跟欧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研究无法等量齐观，但是相对于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研究来说，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后者。而重要的专题如马哈福兹和纪伯伦两位重点作家以及《一千零一夜》作品的译介、研究，具有文学成分的宗教典籍、特殊时期的文学交流等都纳入了作者的考察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是中阿文学交流最为集中的时期，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至今，是中阿文学交流的新时期，也是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数量多、质量高，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亦呈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的三位作者浓墨重彩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就 20 世纪阿拉伯文学发展成就最大的小说而言，

就有数十位来自各个阿拉伯国家的作家的多部题材、风格各异的作品被翻译为汉语，其中不乏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杰作，对其开展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于古代阿拉伯文学作品如《卡利莱与笛木乃》、《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日》、《一百零一夜》和《安塔拉传奇》等，我国学人对其的翻译、研究也在所多有。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作品如《卡利莱与笛木乃》不仅有汉语译本，还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的译本，且翻译时间远早于汉语译本，可堪称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中阿文学友好交流的明证。诗歌的译介方面，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一批古代中国和阿拉伯诗文被翻译到对方国家，多位中国学者从诗歌总论、文学史、诗歌音韵、中阿诗歌对比等角度对阿拉伯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而现代诗歌在我国的译介研究则经历了从主要翻译革命性诗歌到广泛翻译各类诗歌的转变，我国学者对其的研究也在新时期逐步兴盛、繁荣，“无论是译介范围的拓展，还是研究对象的发掘，都有了令人惊喜的发展”^①。现当代戏剧在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国内目前已经有了有一部分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但相关翻译和研究成果仍显不足。新时期阿拉伯文学史的编撰成果丰硕，迄今已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阿拉伯文学史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无不凝聚着作者或译者的心血。中国学者们对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中阿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中阿比较文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平行研究、影响与传播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和研究方法上都占据了相对领先的地位。

而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翻译与研究之所以较少，最重要的原因是阿拉伯世界的中文教育相对于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滞后，缺乏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我国在 1946 年马坚先生从埃及留学归国即与季羨林先生一起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东语系，其中就包括阿拉伯语专业，

^① 鄧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第 177 页。

开启了我国培养现代阿拉伯语人才的历程，到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 8 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2016 年全国开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已经接近 60 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阿拉伯语语言文化（包括文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阿拉伯国家的中文专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在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学设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校的中文专业都是阿拉伯世界的唯一。尽管孔子学院的努力使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中文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但至今仍有很多阿拉伯国家依然没有中文教学，更谈不上中文专业的设立。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 20 世纪综合国力较小，文化影响不大，阿拉伯国家的眼睛是长期向西看的，只有近年中国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以后才有一些阿拉伯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出“向东看”的战略意向。中文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大力发展是进入了 21 世纪以后才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才真正吸引了阿拉伯的目光。而中国文学真正引起阿拉伯读者和知识分子瞩目的是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即便是莫言获奖之后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是在得到了中国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不多，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而可供本书作者们考察的史料本来就不多。当然，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学在阿拉伯译介研究情况的考察可能也会有所遗漏，这也是难免的事情。作为研究阿拉伯文学的中国学者，本书的几位作者虽然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阿拉伯学者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收集资料方面还是诸多不便之处，因此难免有失周到。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著者对此已做了大量宝贵的开拓性工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其他专事中国文学研究的阿拉伯学者会有更好的条件来填补这个缺憾。

在专题研究方面，一是对作家的专题研究，二是对《一千零一夜》这部伟大经典作品的研究。纪伯伦和马哈福兹的确是中国学界对阿拉伯文学进行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广泛也最为深入的两位作家，正如本书

作者所言：“阿拉伯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中，作家辈出，不少具有世界声誉，像乌木鲁勒·盖斯、穆泰纳比、麦阿里、伊本·穆格法、塔哈·侯赛因、台木尔、陶·哈基姆等。但相较之下，还是纪伯伦、马哈福兹的声誉更高，其作品影响也更大，全世界的读者对纪伯伦和马哈福兹也最熟悉。中国对纪伯伦和马哈福兹作品的翻译、对二位作家的研究，也最多。”（第334页）因此，作者列出了专章来进行梳理，从翻译、版本、介绍、研究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一千零一夜》的专题研究不仅有对翻译与研究的梳理，也有作者从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出发做出的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者认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有些故事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奇、小说笔记中的故事如《魔法女王》与《板桥三娘子》、《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与《苏遏》、《终身不笑者的故事》与《妙音》、《侍卫和泼妇》与《巧脱》等，有着高度的重合，从而提出了《一千零一夜》的这些故事与中国传奇、笔记中相似故事存渊源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作者还对特别关注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一千零一夜》部分故事类型、母题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变人为畜、凶屋得金、羽衣姑娘、救蛇得报等等，并对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探究，指出了其中需进一步挖掘之处。尽管作者也没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坐实这种影响关系或渊源关系，但是这种思考无疑是具有启发性价值的。这一章写得很有深度和拓展性，得益于鄧溥浩先生长期对《一千零一夜》的关注和研究。他本人就组织、参与过多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和编译工作，而且他还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出版了《一千零一夜》研究专著的学者，在《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林丰民主编，昆仑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他还专门负责《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在非纯文学类又具有相关文学性的方面，作者梳理了《古兰经》和《圣训》在我国各个时期的翻译情况，指出虽然国内针对这两部典籍已经出现了一些文学性研究和比较研究，但对于其如何影响阿拉伯

文学仍是语焉不详。国内学者向来认为近代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最早的译介当属对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翻译。这两部经典虽被穆斯林奉为宗教经典，但其中的大量文学成分经由译介传入我国，也属中阿文学交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中阿文学交流以带有革命性、战斗性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创作为主，体现了中阿人民支持对方的革命正义斗争的深厚情谊。虽然这个时期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大多是战斗性的，显得较为片面，但也让中国读者了解了一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为中阿文学交流留下了可资纪念的一笔，为今后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开拓了道路。”^① 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交流也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毕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文学交流史的一部分。几位著者没有因为自己的好恶而避开这一段历史，显示了他们学术的客观性立场。

书中还特别提到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在中阿文学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著者认为我国早期对阿拉伯文学作品进行译介与研究的队伍由我国著名文学家和一些回族穆斯林学者共同组成，在后者中，马坚、刘麟瑞、纳忠、纳训等杰出学者是中阿文化、文学交流桥梁最早的构筑者。他们既将阿拉伯作品译介到中国，也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阿拉伯国家。他们一方面将阿拉伯语的《古兰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一千零一夜》等文学作品和文献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也将《论语》、《子夜》等中文文献和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在他们的手中，中阿文化、文学实现了双向的交流。他们是现代中阿文学交流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著者细致地整理了我国阿拉伯文学学界老、中、青三代研究队伍在阿拉伯文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在简要阐述其研究内容之后细述其学术价值与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研究的努力

^① 鄧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第61页。

方向。这些文字既是多年来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同侪学术成果的系统展示，又激励了我们在新的时期踏着前人的脚印，互相扶助，开创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书中坦率地指出阿拉伯文学研究各领域专题研究的缺憾与不足之处，恰恰是对后世学者的勉励，引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和创新热情，还能避免他们在前人耕耘过的领域上做重复工作，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书后附录的中阿文学交流大事记如同一根光彩四射的珠串，将自中国西汉至21世纪以来的中阿文学交流事件串联起来，为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文学上的交汇提供了一条最好的时间线索。

当然，这部洋洋大观的文学交流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譬如，书中列举的一些古代阿拉伯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尚缺实证。唐代诗人李白对月亮的偏爱或受到了其家族出身的古代条支地区（今伊拉克）前伊斯兰时期月亮星辰崇拜的影响，诗人杜甫的一些每行押韵的诗歌受到阿拉伯诗歌格律影响，还有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与阿拉伯故事的相似情节等，学界至今未能找到确凿的单向或双向影响证据，因此无法得到确切证明。诚然，这部分中阿文学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一时之间未能为学者通过学术考据所印证，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证据，就否认民族间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彼此间相同的成分，有些彼此间的影响是明显的，有些则不明显，需要我们作更深入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开掘”^①。著者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有志于中阿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后进学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另外，书中第二、三、四章的章名是各个时期的中阿文学交流，但从章节的具体内容来看，这几章主要阐述的是阿拉伯国家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而很少涉及中国作品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与相关研究。

^① 鄧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第19页。

结 语

总体说来，这部著作第一次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中阿文学交流的脉络，填补了中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文学交流史的空白，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作为一部文学交流史作，本书既有文学史的一般特点，又遵循两国文化、文学“平等交流”“双向交流”的思路，展现了中阿文学在历史的河流中或平行发展、或交错汇合、或互相呼应的风貌。

拥有丰赡文化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远隔千山万水，彼此间的交往历程却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新的时期中阿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建立在双方人民理解对方心理的基础上。文化、文学的交流一向以来在两个文化传统、民族心理迥然不同的人民之间交往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这部中阿文学交流史将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中阿之间的民心相通做出独特的贡献。